

文化 名人

看看文化大家张伯驹的朋友圈

——读张恩岭新作《张伯驹与文化名人》初感

张东成



《张伯驹与文化名人》 张恩岭 著

内容简介

爱国民主人士张伯驹在诗词、书画鉴赏、戏曲等艺术领域均有深厚造诣，享有盛名，是颇具传奇色彩的文化名人之一。

张伯驹交游广泛，朋友众多，留下诸多佳话。本书以人物为单元，精心选取张伯驹与刘海粟、冯其庸、王世襄、梅兰芳、周汝昌等书画界、收藏界、戏曲界、文学界诸多领域文化名人交往的真实故事，多角度再现张伯驹的传奇人生和他所取得的非凡文化艺术成就，彰显其伟大的家国情怀和人格魅力。

作者简介

张恩岭，长期从事张伯驹生平和艺术研究，出版有《张伯驹十五讲》《张伯驹传》《张伯驹词说》《张伯驹联语与诗钟集注》等著作。自1999年起，陆续发表古典诗词赏析、文学评论等方面的文章，结集有《张伯驹词赏析》《逸园诗选赏析》《高梅阁诗赏析》等。2021年3月，成为中国传记文学学会会员。

仲夏午后，我意外收到资深张伯驹研究专家张恩岭先生寄来的《张伯驹与文化名人》一书。欣喜、崇敬，展卷拜读不肯释手。这可能是被同邑文化大家张伯驹先生的朋友圈及其伟大的家国情怀与人格魅力所折服了吧。

《张伯驹与文化名人》一书于2024年6月正式出版发行。这是张恩岭先生继《张伯驹传》《张伯驹词说》《张伯驹联语与诗钟集注》及《张伯驹十五讲》等之后的又一倾情力作。

《张伯驹与文化名人》一书的封面设计新颖，令人赏心悦目。尤其是腰封文字一下子吸引住了我——

文化大家张伯驹的朋友圈：诗画挚友刘海粟，红楼因缘周汝昌，亦师亦友王世襄，白头之交冯其庸……

“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二十多位重磅朋友，二十多段风雅往事，挖掘故事背后的故事，再现张伯驹卓犖不凡的艺术之道、守望文化的真性情、求真求善求美的真风度。

我迫不及待地取出《张伯驹与文化名人》，小心翼翼地一页一页翻看。阅罢，禁不住发出声声赞叹。

紧随张恩岭先生的笔触，我宛如穿越到了那个时代，近距离接触张伯驹等文化先辈，聆听他们对书画、对诗词、对京剧、对古文物等的

深入研究与探讨。

张伯驹是我国著名的书画家、诗词家、文物鉴赏家、京剧艺术研究家，这是我和大多数人对张伯驹先生总的比较笼统的印象。但张恩岭先生的《张伯驹与文化名人》，让我耳目一新，从而对一代名士张伯驹有了更深入、更全面、更清晰的认知。

书中讲到的“文化大家张伯驹的朋友圈”里的大部分故事都是我不知道的，我深感惭愧，方恨读书少矣！

接下来，我暗暗发誓要认真研读《张伯驹与文化名人》，像张恩岭先生那样去深入挖掘和传承张伯驹文化。也正如张恩岭先生在《张伯驹与文化名人》一书序言中所说的那样，通过阅读此书，真正地让国人深切地知道一代名士张伯驹——

是一个最无私而善良的人；
是一个最真诚而天真的人；
是一个最纯粹而痴情的人；
是一个最任性而率真的人；
是一个最正直而热心的人；
是一个最老实而毫无心机的人；
是一个貌似冷漠而内心友好的人；
是一个天性豁达而乐天的人；
是一个无畏生死而执着的人；
是一个拥有民族大义而赤诚爱国的人。

张伯驹的金刚怒目

任动

世人在谈论中国著名隐逸诗人陶渊明的时候，大都认为，陶渊明身上既有散淡飘逸的一面，也有金刚怒目的一面，而这恰好构成陶渊明的双重人格。比如，鲁迅就曾说：“被论客赞赏着‘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陶潜先生，在后人的心目中，实在飘逸得太久了。”“就是诗，除论客所佩服的‘悠然见南山’之外，也还有‘精卫衔微木，将以填沧海。刑天舞干戚，猛志固常在’之类的‘金刚怒目’式。”

张伯驹和陶渊明一样，亦有散淡飘逸和金刚怒目的双重文化人格。在一般人眼里，张伯驹不慕名利，恬然自乐，一副世外隐士的形象，殊不知，他同样嫉恶如仇，敢于直言，勇于抗争，对于各种丑恶现象，往往直接发声，予以针砭。

我们读过张伯驹的《三希堂晋帖》，即可真切感知他的金刚怒目。众所周知，清代乾隆是一位书画皇帝，收藏了不少历代书画真迹，尤其看重王羲之的《快雪时晴帖》、王献之的《中秋帖》和王珣的《伯远帖》。后来，《中秋帖》和《伯远帖》归郭世五所有。抗日战争胜利以后，张伯驹恐怕《中秋帖》和《伯远帖》流失海外，遂委托惠古斋老板柳春农打探，得知此二帖在郭世五之子郭

昭俊手中，张伯驹欲收蓄之，奈何郭昭俊狮子大张口，一帖即要价三千万联币，合当时黄金一千两，张伯驹财力不逮，只好作罢。可是不久，当时的国民党行政院院长宋子文到北京视察，郭昭俊将《中秋帖》和《伯远帖》贿于宋子文，因而谋得中央银行北京分行襄理职务。

张伯驹闻听大怒，郁结于胸，难以平复。翌年，张伯驹的朋友潘伯鹰在上海主编《新民晚报》副刊，专门来信向张伯驹约稿。于是，张伯驹说：“余写《故官散佚书画见闻记》应之，遂揭露二希法帖经过。”文章刊发以后，舆论大哗，众说纷纭。宋子文畏惧舆论，急忙将《中秋帖》和《伯远帖》退还郭昭俊，以平息众怒。

张伯驹此举，显示了他嫉恶如仇、敢于和邪恶势力斗争、金刚怒目的文化人格。与此相应，张伯驹还深刻揭露了旧时代社会的黑暗。“王■、王献之二帖，今由郭昭俊自中南银行取出，携至台北，将求善价。此种国宝竟容私人如此挟逃，又竟无人管，怪极。”以上张伯驹引用当时《新民晚报·艺坛通讯》的一段文字，寥寥数语，便将当时国统区社会动荡、法纪松弛，任由文物贩子胡作非为，导致大量国宝流失海外等种种怪象乱象，毫不留情地剥开示人。这些都可以看出张伯驹金刚怒目的

一面。

张伯驹对不平之事，常常语含讽刺，显示了其刚正不阿、嫉恶如仇的文化人格。宋代伊始，殿试后皇帝宣布登科进士的名次，还要为新科进士举行宴会，赐宴庆贺。由于赐宴都是在著名的琼林苑进行，是为“琼林宴”。张伯驹的随笔《琼林宴》，先对有清一代所谓的“琼林宴”进行叙述：“琼林宴由光禄寺及礼部承办，新科进士齐集拜揖入座，二人一席，席各陈干果十几事，坐定后旋即起拜辞去，干果则由何役一抢而空。视此颇如戏台上之饮宴，只少吹牌子耳。”接着，张伯驹又写他的朋友溥叔明，自叙其结婚时入宫赐宴的情形：“行礼后衣冠入席，止一人，肴饌满前，但例不能举箸，少坐起，谢恩出。”然后，张伯驹生发议论：“宫廷赐宴尚如此，则光禄寺礼部之琼林宴可知。故当时有口号云：‘光禄寺茶汤，武备院刀枪，翰林院文章，太常寺笙簧，钦天监阴阳，太医院药方。’言皆样子货也。”张伯驹援引当时的民谚，针砭了“琼林宴”等中看不中用的“样子货”，实则意在言外，鞭挞的不仅仅是上述种种，而是一切不合理的社会丑恶世相，深刻含蓄又入木三分。张伯驹金刚怒目、孤高狷介之个性也因之确立。